

## 解读巴黎高师：文化资本的视角

李永全 胡钦晓

**摘要：**巴黎高师作为一所微型高校，却在教育场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发现巴黎高师的个体性文化资本、产品性文化资本以及制度性文化资本的深厚底蕴，是巴黎高师成功的深层原因。使我们明确在高校发展过程中大师与大楼、软件与硬件、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问题，为我国高校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巴黎高师；个体性文化资本；产品性文化资本；制度性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9.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4-0042-05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巴黎高师，建立于1794年10月，是一所仅有2000余名学生的微型学校，但却培养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和8位素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得主<sup>[1]</sup>。仅此数据足以使我国高校羡慕不已。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此功勋卓著的巴黎高师，它又对我国高校建设发展有着怎样的启示，这一因、一启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引入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分析并回答上述问题，在理论上为我们剖析某种教育现象提供了新视角，在实践中对教育个体(或组织)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 一、布迪厄文化资本的内涵解析

文化资本概念的正式提出可以追溯至1986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资本的形式》一文当中。布迪厄认为：“事实上，除非人们回归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认可的那一种形式，否则，是不可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功能的”。<sup>[2]241</sup>他突破原有单一的经济资本形式，创造性地将资本的形式扩展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在进一步剖析过程中布迪厄又将文化资本划分为三种具体表现形

式：一是个体化形式，指个体本身所具有的知识、技能、情趣等文化能力；二是客观化形式，指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产品，如书籍、绘画、雕塑以及机械设备等；三是制度化形式，指将个体所掌握的知识技能通过某种社会认证制度加以确认，形成以文凭或资格证书来衡量个体文化程度的制度性标尺<sup>[2]244</sup>。依据以上表述我们可以将文化资本划分为：个体性文化资本、产品性文化资本和制度性文化资本。

为了论述文化资本的作用，布迪厄引入了“惯习”(habitus)和“场域”(field)两个社会学概念。惯习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持续不断地获得观点、思想和行为的性情倾向体系”<sup>[3]</sup>。它是在人们日常学习生活中不断积累塑造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外界文化因素对惯习的塑造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当人们从事实践活动时，他本身所具有的惯习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他的行为产生导向作用。而场域则指“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sup>[4]142</sup>。场域的原动力来自事物在网络或构造中由于位置间差异所造成的冲突。个体要想控制场域并从中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就必须占据场域中的优势位置。这就如同战争中兵家必争的有利地形一样，而说到底要占据有利地形必须拥有比对方更为雄厚的实力，而实力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就表现为一种资本。所以说“一种资本只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大学学术资本研究”，项目编号：10YJA880042。

收稿日期：2011-02-23

作者简介：李永全(1986-)，男，黑龙江佳木斯人，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胡钦晓(1972-)，男，山东巨野人，教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科研处副处长，从事高等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历史与比较研究；曲阜，273165。

有在相应的场域内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sup>[5]</sup>。文化资本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对个体惯习的塑造，将个体分配到一定场域中各个位置上。当个体丰富的文化资本与所在场域需求的类型相一致时，由其所塑造的惯习就愈加适应场域中的优势位置，从而使个体获得对场域的控制权，主导着场域的发展方向。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文化资本能使个体在社会场域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广泛的影响力，逆向推之，广泛的影响力还会给个体的发展带来额外的文化资本积累资源与途径，这种双向互利过程对个体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将个体推广到组织（组织也可看作为某种个体），如一所高校，文化资本对高校在教育场域内的位置分布同样起着巨大影响作用。

## 二、巴黎高师的个体性文化资本

巴黎高师个体性文化资本的积累实质是高师自身惯习的塑造过程，即将外部知识融入到高师的内部组织当中，并表现为高师人在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等性情倾向上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知识成为影响个体性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个体性文化资本的积累还要充分考虑到个体的投入。布迪厄将个体的投入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时间的投入，其次是伴随着各种匮乏、痛苦以及必要牺牲的社会建构性利比多的投入。<sup>[2]246</sup>而对于这些投入的最终结果——所获得的个体性文化资本，进行的考察必须深入到巴黎高师组织内部，从其成员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来映衬高师整体所具有的个体性文化资本。虽然这种论证方式并不能完全代表或展示巴黎高师个体性文化资本，但是却能使我们清晰地认识高师个体性文化资本的重点与纲目。毫无疑问，对于高校而言，学生、教师和管理者的代表——校长，是其构成的主体，对他们的文化资本进行分析则显得尤为重要。

### （一）学生的文化资本

巴黎高师十分重视学生质量，并且一贯秉承一流学校构成主体是优秀学生的办学理念。对于学生优秀与否判定的标准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所拥有的个体性文化资本。而在学生个体性文化资本中，巴黎高师最为看重的是学生文理综合素养。例如，巴黎高师文科生中四分之一的学生是通过一种

会考后录取的，会考除了文学、哲学和历史三篇大作文以外，还包括一项严格的数学考试<sup>[6]</sup>。而当这些考试的胜利者进入高师后，为他们所开设的学习课程以及研究领域无不体现了这种文理互通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近年来，巴黎高师为了更进一步深化文理科之间的融合，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相继成立了“认知论学部”，“环境学科组”和“科学、历史和哲学课程组”三种教学组织单位。这种跨学科教学平台的打造，一方面陶冶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的科学思维，从而实现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整合。由此，学生所获得的这种特定文化能力，都会从它在文化资本分布中所占据的地位而获得一种“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并为其拥有者带来明显的利润<sup>[4]196</sup>。这种利润通过毕业生在就业场域中的优势便可得到印证。通常而言，高师毕业生会在教育、科技及文化等领域担任要职，且待遇优厚，明显优越于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sup>[7]</sup>。

### （二）教师的文化资本

目前，巴黎高师拥有专、兼职教授和研究人员约80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于与学校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科研单位、大学和国家级的研究组织，这其中就包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INSERM），法国国立计算机及自动化研究院（INRIA）等研究组织。<sup>[8]</sup>能够在这些机构从事科研工作，其本身就是对个人文化资本的认可。巴黎高师教师的学术造诣，由此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巴黎高师每年都会邀请大批外国知名教授前来讲学以及开展科学研究工作。2003年巴黎高师与我国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学生教师”项目，在人文学科领域双方每年互派一位博士生开展为期一年的教学活动。这种多元化的教师构成体系，不仅加强了巴黎高师与其他研究机构、大学间的密切联系，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术壁垒，促进了新兴研究领域的兴起与发展。与此同时，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学术环境也极大地激发了教师的创造热情，并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5-2010年，巴黎高师科学部共有37人获得国家、国际大奖或荣誉称号，约占全体科学部教师总人数的8%<sup>[9]</sup>。这些奖项及荣誉的取得，充分显示了巴黎高师教师群体的文化实力，鉴证了巴黎高师个体性文化资本，奠定了巴黎高师在科学场域中的地位。

### （三）校长的文化资本

巴黎高师的微而强还与她的校长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密不可分。作为学校的管理核心，校长除了应具备一般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这种能力是文化积淀的产物，它需要个体在理论与实践学习过程当中投入相应的“利比多”才能获得。保罗·杜比（Paul Dupuy）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卓越管理才能的人，他曾于1885-1925年担任巴黎高师校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比赋予了巴黎高师新的生命。在他之前巴黎高师仍然保留着“戴莱姆修道院”<sup>[10]13</sup>式的管理制度，学生受控于严格的作息时间，没有任何自由可言<sup>[11]</sup>。这种管理制度严重阻碍了学生自由的创造力，不利于新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杜比以其出众的管理技能，超前的办学理念，打破了高师原有旧制度，使巴黎高师逐渐成为一所“无政府主义的家园、一片思想和身体自由的绿洲”<sup>[10]14</sup>。学术的自由带来了高师人在思想田野上的奔驰，在科学巨浪中的搏击，收获了高师人所独有的“高师精神”。这种精神是由巴黎高师的学生、教师和校长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为此忍受着求知的痛苦，教学的乏味和管理的压力。与此同时，这种精神又反过来影响着高师未来的发展。这一特有的精神品质就是我们所论述的个体性文化资本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塑造了巴黎高师所独有的惯习，使高师人走上了教育场域的顶端，铸就了巴黎高师世界著名学府的地位。

## 三、巴黎高师的产品性文化资本

产品性文化资本与个体性文化资本的最大区别在于两者的载体不同：个体性文化资本与人（或组织）的生物性相连接，因此其载体就是人（或组织）本身；而产品性文化资本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化产品而存在，所以它的载体为客观物质。不管是人（或组织）还是物，文化资本的价值都不在于其所附着的载体所拥有的价值，而是在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权力的价值。然而产品性文化资本所蕴含的象征性权力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必须要以个体的参与为前提。这就使得产品性文化资本与个体性文化资本之间的联系成为必然，只有在个体充分吸收文化产品中的文化要素时，才能使文化的象征性权力的发挥成为可能。

巴黎高师在20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积累了大量

产品性文化资本，其中最为重要的要数图书馆。这里所说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方面作为普通意义上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图书，蕴含着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成为产品性文化资本的典型代表。它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求知若渴的高师人来到此度过他们充实而美好的大学时光，诚如从高师走出的大作家让·格埃诺（Jean Guéhenno）所说的那样：“高师就是一群围绕着图书馆的年轻人”。<sup>[10]14</sup>另一方面，图书馆对于高师人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拥有博大精深的典藏，还在于那里有着一位“精神导师”级的图书管理员——吕西安·埃尔（Lucien Herr）。埃尔是巴黎高师1883届的毕业生，并于1886至1926年担任图书管理员一职<sup>[10]29-30</sup>。他用辛勤劳动，换来了学生查阅书籍的便利，促进了学生与知识的融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高师人。虽然人已逝去，但他那挺立在图书馆中的青铜塑像所散发的奉献、服务精神，成为图书馆这一产品性文化资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如今的巴黎高师图书馆不仅实现了开放式借阅，而且建立了与国家数字网络图书馆、联邦古代文献资源库、拉丁区纪录片资源网和大学联盟图书馆的网络借阅关系，从而为学生和教师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更多便利<sup>[12]</sup>。

如果说埃尔的图书馆更多的是巴黎高师文科生如痴如醉的地方，那么以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领军的理科实验室则彰显着巴黎高师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巴斯德这位“科学无国界，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的提出者，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他所从事的职业。在他的领导与影响下，虽历经风雨，巴黎高师的实验室一直处于世界顶级水平。不仅在此创立了微生物科学，而且还发明了挽救无数人生命的狂犬、炭疽和霍乱疫苗。至今巴黎高师还保留着这位科学巨匠当年实验室的原貌，以此种方式传承他对科学探究的不竭精神动力，每一位致力于探究科学奥秘的高师人深受感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往能使人看得更远，巴黎高师的7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1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sup>[13]</sup>就很清晰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涵。这些世界级科学家与高师处于世界顶尖级的实验室密不可分，更与其中包含的科学探究精神融为一体。与其优良的硬件设施相比，巴黎高师更加注重软件的建设。这些实验室对校外科研人员同样开放，这就扩大了巴黎高师与外界的学术交流，拓展了产品性

文化资本象征性权力发挥的范围。

#### 四、巴黎高师的制度性文化资本

制度性文化资本意在将个体本身所具有的个体性文化资本通过某种标准加以区分，并以制度的形式进行规范，从而获得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社会认可度。其作用的发挥实际上是通过在社会场域中制造“区隔”（distinction）来实现的。区隔——就世界的一般意义而言——当其被觉察到与适应于该结构的分类相一致时，它是记录于社会空间真实结构的差异。<sup>[14]</sup>换言之，区隔就是通过制度性的认可把存在于社会场域中的差异合法化、制度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优势文化资本与劣势文化资本加以区分，确立优势文化资本在社会场域中的主导地位。

巴黎高师最为显著的制度性文化资本在于它拥有大学校（Grandes écoles）头衔，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大学。大学校是法国所独有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它的招生对象主要是高中毕业后读了两年预科的学生，这就使大学校的办学层次相当于我国大学本科三、四年级加研究生教育。在法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大学体现的是教育的公平与民主，只要学生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合格就有机会申请进入大学学习。而对于大学校而言，则是法国精英型高等教育的代表，学生在完成两年预科的学习后还要通过极其严格的考试方能进入大学校。巴黎高师作为大学校中的佼佼者，其入学门槛更是高得令人恐惧，每年报考者有4万之众，而学校却只招收200多人。除生源优势之外，这种制度性文化资本使巴黎高师获得了更多的国家经济资助与社会认可度。巴黎高师的学生不仅不用缴纳学费而且还享受准公务员待遇，每月能领到1200欧元的补助<sup>[15]</sup>。这种优厚的生活待遇保证了每名学生不会因经济问题而影响学业，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之中。再者，充足的资金能使学校购进大量先进设备，为其前沿学科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在社会认可度方面，法国民众对大学校更是情有独钟，凡是校名中带有 école、collège、institut 等字眼的学生都会被另眼相看，而 université 则不具有这种待遇。在以上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制性权力的行为魔力，看到强迫别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sup>[4]201</sup>。在这种制度性权力的驱使

下，巴黎高师走上了法国高等教育场域的最高层，成为精英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典型代表。

需要深入指出的是，虽然巴黎高师身处大学校制度的优越环境之中，有着充足的资金和社会认可度，但其自身还是非常注重个体性文化资本积累而相对忽视制度性文化资本。其中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就是巴黎高师从不授予学生毕业证和学位证，它只有简单的学生名册而已。这充分体现了巴黎高师在看待个体性文化资本与制度性文化资本之间关系问题上的正确认识。

#### 五、启示与借鉴

巴黎高师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自身努力积累了大量个体性文化资本和产品性文化资本，再加之其优越的制度性文化资本共同构成了巴黎高师成功的主要原因。这给我国迅速扩张的高校如何走向成功提供了一个现实借鉴事例。

首先，个体性文化资本的积累，使我们明确了大师与大楼的取舍问题。大师是个体性文化资本的代表，一所学校只有注重了大师的培养与引进才能确保良好的教学质量。大师的作用不仅关乎到一门学科的建设，在多数情况下还能影响一个学科群的形成与发展。而大楼只是学生学习或生活的场所而已，它本身与学生的教育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正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sup>[16]</sup>当我国的大学忙于扩建校园，增盖高楼甚至是奢华的门庭时，应该对这种资源浪费现象有所反思。如能将这些经济资本投入于教师的培养与发展，我国的高校将会获得更好的内涵式发展。

其次，产品性文化资本的积累，要求我们正确处理软件与硬件的关系。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建设与高校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每所高校都会在其简介中标明藏书数量和实验设备总值。但是仅有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显然是不够的，一座好的图书馆不能单以藏书量的多寡来衡量，还要考虑它的运行与管理是否做到了高效快捷地为广大师生服务。再先进的实验设备也要有人的参与才能实现它本身的价值，不能使这些巨额购进的仪器成为评估用的装饰。我国的高校应向巴黎高师学习，在有着丰富产品性文化资本的同时，努力实现这些资本的转化，提升资本利用空间。

再次, 制度性文化资本的获得, 使我们理解重点大学与非重点的真谛。我国虽然没有大学校制度, 但是我们的高校有大学与学院之分、“211”与非“211”之别、“985”与非“985”之异。特别是对那些处于劣势制度性文化资本的高校, 要明确优势制度性文化资本的获得要以个体性文化资本的积累为前提, 不能一味重视名称所赋予的外显荣誉和影响力。近年来不少学院即使在自身条件不能达到大学基本要求的情况下也纷纷急于将学院的名头换掉, 而普通的大学则不惜重金向“211”挺进, 致使我国的高校办学层次严重趋同。巴黎高师身处大学校之列, 却从不给毕业生颁发毕业证, 其1924届毕业生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甚至拒领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sup>[10]216</sup>, 这种现象对于我国的高校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震撼。我们的高校虽然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种更加注重个体性文化资本积累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追求, 却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 参考文献

- [1] Anon. Une grande école de recherche universitaire [EB/OL]. (s. d.) [2011-04-13]. <http://www.ens.fr/spip.php?rubrique8&lang=fr>.
- [2]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M]//Halsey, A. H.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 [3] Anon. Habitus [EB/OL]. Wikipedia. (s. d.) [2011-06-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ierre\\_Bourdieu#Field](http://en.wikipedia.org/wiki/Pierre_Bourdieu#Field).
- [4] 布尔迪厄, P.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 [M]. 包亚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5] Bourdieu, P. & Wacquant,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2: 101.
- [6] 于杰, G.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专业: 怎样共存和竞争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6): 37.
- [7] 庞青山. 法国高等教育特色制度的演进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1(3): 39.
- [8] Anon. Enseignants et chercheurs [EB/OL]. (s. d.) [2011-04-15]. <http://www.ens.fr/spip.php?rubrique57&lang=fr>.
- [9] Anon. Prix et distinctions accordés aux chercheurs de l'ENS depuis 2005 [EB/OL]. (s. d.) [2011-04-13]. <http://www.ens.fr/s-pip.php?article301&lang=fr>.
- [10] 杜费, F.; 杜福尔, P. 巴黎高师史 [M]. 程小牧,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Smith, R. J. *The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and the Third Republic*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2: 80.
- [12] Anon. Bibliothèques et ressources documentaires [EB/OL]. (s. d.) [2011-04-11]. <http://www.ens.fr/spip.php?rubrique11&lang=fr>.
- [13] Anon. List of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eople [EB/OL]. (s. d.) [2011-04-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3%89cole\\_Normale\\_Sup%C3%A9rieure\\_people](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3%89cole_Normale_Sup%C3%A9rieure_people).
- [14] 布迪厄, P. 文化权力 [M]//薛晓源, 曹荣湘.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7.
- [15] 王金瑶, 来明敏. 巴黎高师具有创造性的办学理念剖析与启示 [J]. 现代大学教育, 2008(5): 46.
- [16] 梅贻琦. 梅贻琦教育论著选 [G]//刘述礼, 黄延复, 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10

(责任编辑 庞青山)